图为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白湖湿地，庐江县通过清淤疏浚、调水引流、生态修复、沿河景观建设等综合整治措施，使湿地水清岸绿、活水四季长流。 左学长摄（中经视觉）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生态环境部部长 黄润秋

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的核心制度，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有力抓手，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出发，将排污许可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全国生态环境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先发证、后到位”的总要求，积极推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对固定污染源实施“一证式”管理。截至2020年底，全国各省区市已将273.44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对33.77万家核发排污许可证，对应发证但暂不具备条件的3.15万家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对236.52万家污染物排放量很小的填报排污登记表，已经基本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为排污许可制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法治基础。要认真贯彻实施好《条例》，打深打牢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文明水平，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全面把握《条例》颁布实施对提升环境治理效能、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意义

《条例》颁行提升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条例》依据法律授权，对排污许可的范围、程序、证后监管、法律责任等进行了系统规定，为推进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条例》颁布实施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有力抓手。《条例》提出了多项以排污许可证为载体，不断降低污染物排放，从而促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制度安排，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驾护航。重点区域蓝天保卫战强化监督定点帮扶结果表明，已发排污许可证企业基本均已按要求安装废气或废水污染治理设施，而应发未发的排污单位，仅70%安装废气污染治理设施、40%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排污许可制度对企业治理污染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

《条例》实现了我国固定污染源监管流程的再造。排污许可制是“归一”，而不是“加一”，是一个整合各项制度的固定源管理的“底座”，让法律法规对一个企业提出的所有环保要求衔接融合到一个证上来，让信息和数据共享到一个高效统一的平台上来。《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对污染物排放的管理从过去以准入为主的管理向既抓审批又抓事中事后监管的全流程管理转变。

准确把握《条例》的创新规定和深刻内涵

《条例》定位于构建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环境监管制度，以建立“一证式”管理模式、实现固定污染源全覆盖、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落实排污单位主体责任为原则，采用一系列创新突破措施落实改革需要和解决工作难题。

进一步明确了排污许可证的法律效力和地位。《条例》依据法律明确规定，排污单位无证不得排污，实施按证排污、按证监管的管理模式；将排污许可证作为企业守法、行政执法、社会监督的重要依据；统一污染物排放相关数据，为生态环境统计、排放总量考核、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等工作提供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数据。

要求实现固定污染源全覆盖。过去不少排污单位游离于生态环境管理范围外，大量排污单位没有纳入到排污许可，成了全国生态环境系统的心病和心痛。《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有望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完善了排污许可分类管理。为了解决单个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影响程度很小，但总数量巨大、排污总量不低的排污单位长期游离于环境监管视野之外这一困扰已久的问题，《条例》在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的基础上，还增加了登记管理，规定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很小和生态环境危害程度很低的排污单位，不需要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仅需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登记污染物排放基本情况，将这类排污影响很小的单位全部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有利于全面掌握固定污染源数量，起到对排污许可分类管理的补充作用。

推动相关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全联动。《条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深度衔接融合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环境执法、环境统计等各项生态环境制度，将分散的管理制度整合到固定污染源全过程管理。

加快推动《条例》有力有效落地实施

《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凸显了排污许可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加大工作力度，认真贯彻实施好《条例》。

有序推进固定污染源“全覆盖”工作。一是要根据《条例》规定，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进行分类管理和填报登记，有条不紊按行业推进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做到排污许可证应发尽发；二是要进一步加大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工作，对暂不能达到许可条件的企业开展帮扶、督促整改。

推进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衔接整合。深入开展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衔接，推动形成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个名录、一套标准、一张表单、一个平台、一套数据”。改革总量控制制度，以许可排放量作为固定污染源总量控制指标，以许可证执行报告中的实际排放量考核固定污染源总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强化证后检查和依证监管执法。一是加大对排污许可证后监管工作的投入，加强监管人员培训，不断完善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能力；二是持续开展已核发排污许可证抽查，探索执行报告审计式检查。将排污许可证执法检查纳入年度执法计划，实现排污许可证常态化执法检查。

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企业做好减负服务。进一步简化排污许可的管理和技术要求，继续研究出台和修改完善排污许可相关配套政策，给企业明确稳定的污染排放管控要求和预期、推动形成公平规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等。

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统一思想，组织好《条例》的学习和宣传，强化举措，全面保障《条例》实施，推动《条例》实施任务再细化、落实再提速、基础再夯实、责任再强化，以钉钉子的精神逐项深入落实，有力有效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纵深发展，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生态谈

木瓜长在荒地上

本报记者 曹松

“快来尝尝新鲜的木瓜，我们这里属于河谷地区，木瓜树长得特别好。”在云南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洒海村的一片山坡上，村民张国兵热情地招呼记者。

随着气温升高，农户们正忙着给木瓜树施春季肥。这种名为“红妃”的木瓜，正成为他们增收致富的甜蜜果。

东川铜矿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这里采矿历史悠久，是我国著名的产铜基地。作为东川四大矿山之一的“汤丹矿”，就坐落在汤丹镇洒海村。几十年来，东川铜矿为国家工业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矿产资源逐渐枯竭，以及矿山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汤丹镇形成的荒山、荒坡、荒滩和荒废尾矿库，成为当地群众发家致富的绊脚石。

“缺少植被保护的荒山、荒坡水土流失严重，群众生活也很贫困。”汤丹镇镇长苏华说。

饱受环境破坏带来的伤害，汤丹镇的干部群众渴望找到一条生态发展道路。2018年年末，经过外出考察，汤丹镇决定动员群众在荒山上种植木瓜。

“一开始村民们都不相信，连玉米都种不出的荒山，还想要种水果？大家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苏华说，质疑并没有打击村镇干部的信心。汤丹镇属于河谷气候，白天较为炎热，具备种植木瓜的条件。当地党员干部带头种树，从山上引水、把喷灌设施安装到每棵木瓜树根部。2019年春天，近5万棵“红妃”木瓜树在荒坡上扎了根，通过精心管理，木瓜树当年就实现了挂果。“由于气候适宜，种下的木瓜一年四季都能采摘，熟果可以直接吃或榨果汁，生果可以凉拌或炖汤，在当地市场上很受欢迎，销售火爆。”苏华说。

起初不看好木瓜种植的农户们，也开始积极学习技术，纷纷加入种植木瓜的队伍中。汤丹镇采取“支部+协会+基地”的建设模式，把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不断扩大种植面积，目前已经建成1000亩“红妃”木瓜基地。“每亩地可以种植木瓜120棵，每棵果树平均挂果30公斤左右，去年产值在2100万元左右。”汤丹镇党委书记罗雄说。

通过种植木瓜，汤丹镇不但绿化了荒山、美化了环境，还解决了村集体经济增收和50多人的就业问题。张国兵把土地流转给种植基地，日常还到基地里务工，一年有3万多元的收入。“我买了相关书籍转行现学种木瓜。”张国兵说，虽然是第一次种植水果，但环境适宜、木瓜养护简单，村民们都感觉好上手。

除了荒山变果园，汤丹镇还把原来一块荒坡地建成了164户村民的新家园。2020年，汤丹镇在已闭库的小江尾矿库通过覆土复绿，试种500亩各色花卉，把尾矿库变成了花海，吸引游客观光打卡。下一步，汤丹镇还计划在小清河荒滩打造文旅廊道、康养度假民宿和特色美食街道等，将荒滩变为乐园，吸引游客前来赏花摘果、休闲旅游，为村民进一步增收创造平台和空间。

“荒山、荒坡、荒滩、荒废尾矿库这‘四荒’变‘四美’，干部群众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计划把洒海村建设成古铜韵味、特色餐饮、瓜果采买、周末休憩的乡村振兴示范点，让群众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罗雄说，农民脱贫致富了，当地的乡村旅游业也该迈开大步了。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四川建成二点八万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点位

本报成都讯（记者刘畅）按照“部门管理、分级建设、全省覆盖”的建设模式，四川围绕水、气、土、生态、污染源等要素，已建成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点位2.8万余个，其中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近2.5万个、生态质量监测点位100余个、污染源监测点位3000余个。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雷毅说，自2017年印发《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方案》以来，通过近几年的强力推动，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已经实现了从手工到自动、粗放到精准，分散封闭到集成联动的转变，基本完成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三年目标任务，实现了市县城市、主要干支流监测点位全覆盖，要素基本完整。

雷毅表示，“十二五”期间环境质量监测大部分以手工监测为主，经过5年的建设，自动监测站点由296个增加至2634个，比2015年增加了近8倍，基本实现全省市县城市环境空气、地表水水质自动站全覆盖。

此外，在污染源监控方面，四川立足实际，探索监测新路径，选取成都、攀枝花、泸州等6个市49个行业516家重点监管企业开展第一批污染源在线监测监控体系试点建设，已安装在线监测设备324套、视频监控837套、用电监控1828套，实现了新型化监控手段“用电监控”的零突破，通过远程查询企业用电量即可得知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监控触角进一步延伸。

在第一批试点建成后，截至2020年底，四川仅依靠“用电监控”就查实排污行为近百起。

下一步，四川将重点在大气、水、工业园区等方面发力，力争形成环境质量、污染源和生态质量监测全覆盖，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监测新格局，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技术保障。

普氏野马重归准噶尔盆地20年

本报记者 耿丹丹

普氏野马在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饲养区内进行半散放训练。 张赫凡摄（中经视觉）

清晨7点，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饲养员高守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清扫喂草平台、清理马圈粪便、配比精饲料，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要观察马粪。“马粪的形状、颜色、气味能直观地反映普氏野马的健康状况。”高守勤说。

普氏野马是拥有6000万年进化史的活化石，目前全世界仅存2400余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由于捕猎和环境问题，普氏野马曾在原生地准噶尔盆地消失。位于准噶尔盆地东南部的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主要负责野马重新引入、繁殖和野放研究。目前，中心有野马477匹，其中野放种群267匹、半散放种群113匹、圈养种群97匹，是世界上野马数量最多的野马繁殖基地。

“野马体型骨骼短小粗壮，额毛少，鬃毛短而直立，而且每匹野马脊背至尾基上部有一条较窄的黑褐色脊线。”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主任杨建明指着一匹野马标本，向记者介绍起来，“野马和家马看起来很像，但是区别很大，它是一种荒漠类大型野生动物。”

研究中心成立于1986年，在引进24匹野马的基础上，成功繁育了6代760匹野马，野马放归试验已取得探索性成功，成为我国物种重引入的成功典范。“2001年，27匹野马被放归卡拉麦里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这是我国首次野马野放试验的尝试，普氏野马终于回归原生地准噶尔盆地。之后，陆续有16批次110匹野马放归野外。”杨建明说，研究中心计划今年野放20匹野马。

研究中心的饲养区是核心区域，面积有220余亩。在饲养区的观马平台，记者看到，饲养区分隔了12个马舍，每个马舍按照科学组群的方式进行分群。“为了让野马更好地适应环境，我们设计了9000亩的散放大围栏，野马可以在更广阔的环境里适应大自然，最终让它们回归野外。”杨建明说。

为了顺利实施野马放归野外计划，研究中心从去年开始加强野马放归前的装运训练。每年野放时，需要将野马运输至卡拉麦里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提前进行装运训练，以增强野马对运马箱、起吊、路途颠簸及鸣笛声的适应，降低伤亡风险。

“通过在通道和量身打造的运马箱内投放饲草诱使野马进入，让野马慢慢熟悉并适应运马箱。”高守勤说，这也是饲养人员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训练之后，就能消除野马对运马箱的恐惧感。等野马能自由在运马箱内穿行后，再进行起吊、运输等环节。

“挑选野放的野马需要参考4个因素，包括谱系关系、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健康状况。”杨建明告诉记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野放的成功率。

近年来，研究中心通过开展普氏野马对环境适应性、饲草料变化的适应性和抵御疾病能力的研究，进一步提高圈养野马遗传多样性和活力。同时，研究中心不断扩大野马互换交流的国际合作。2005年，研究中心从德国引入了6匹雄性普氏野马，2012年又成功向蒙古国输送4匹雄性普氏野马，改善了野马的基因状况、维护了其遗传多样性、改善了小种群近亲繁殖造成的种群退化状况，对于促进种群优化，提高野马繁殖率、成活率及抗病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野马归野仍面临着难题。“研究中心最初引进的24匹野马已过繁殖黄金期，其余种马都是自繁野马，近亲繁殖问题日益突出。其次，野马的生息地经常受到人畜干扰，再加上保护区内植被稀少，监测设备落后，马群生存难度加大。”杨建明说，2500匹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种群，繁殖是物种得以延续下去的唯一手段，“今年，我们计划进口一套液压装置保定栏，给野马做保护性固定，这样方便野马的体检、打号、疾病治疗等，最重要的是解决人工授精的难题。”